

二仙齋叢書

劉尚恒 著

香 港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二餘齋叢稿

楊克家題

劉尚恒 著

香 港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2 年 12 月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二餘齋叢稿

作者：劉尚恒

出版發行：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

電 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 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刷者：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定 價：港 幣 20 元

人民幣 20 元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版・香港

目 录

一、古籍文献学

中国古籍丛书概说	(1)
古籍概念浅谈	(15)
试论工具书的概念和类别	(19)
徽州文献、文书繁富原因探析	(27)
明清徽商藏书与刻书	(36)
新见明末刘宗周残稿及其边事奏疏佚文三件	(47)
读四库馆臣未见书《俞渐川集》	(55)
清管庭芬稿本《一瓿笔存》等三种叙录	(60)
韶山毛氏族谱与毛泽东家世	(68)

二、版本目录学

《棠湖诗稿》考辨	(82)
新见明万历《天一阁书目》考述	(96)
从分类学角度看《四库全书总目》	(113)
《四库全书总目》分类辨证	(118)
论古籍刻工之研究	(125)
《虬川黄氏宗谱》与黄姓刻工	(135)
宁国府刻工考述	(150)

目 录

三、藏书文化

- 清俸买来手自校,黄金散尽为收书
——论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聚集…………… (159)
- 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
——论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流通…………… (168)
- 乐宜偕众,书不藏家
——再论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流通…………… (177)
- 过眼云烟等闲视,泡影山河岂偶然
——论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散佚…………… (187)
- 明代藩府藏书考述…………… (196)
- 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
——柳如是和钱谦益的书缘…………… (206)
- 家族藏书重教与家族人才成长
——清代中期安徽泾县朱氏培风阁藏书…………… (221)
- 审时度势越旧矩,继往开来创新篇
——缪荃孙对我国近代藏书事业的贡献…………… (231)
- 书林巨擘,功在国家
——记周叔弢先生的藏书事业…………… (243)
- 赖著《清代天禄琳琅藏书印记研究》评议…………… (254)

四、方志学

- 略论清刻方志的善本收录问题…………… (266)
- 论方志的著录…………… (272)
- 安徽方志述评…………… (285)
- 安徽佚志述略…………… (296)
- 浅谈闵纂《黄山志定本》…………… (303)
- 任凤苞先生和他的天春园藏志…………… (306)

五、文史杂考

也谈万春圩的兴建

——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320)

于湖考辨…………… (328)

“玩鞭春色”故事考…………… (334)

朱升简论…………… (340)

萧云从事迹考…………… (355)

安麓村事迹汇考…………… (363)

水西庄研究中史实辨证十则…………… (377)

“桥亭卜卦砚”之流传及其真伪试探…………… (386)

后 记…………… (397)

中国古籍丛书概说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丛书是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据估计,我国从雕版印刷术发明到辛亥革命为止。现存古代典籍约有十五万种之多,而丛书一类所收约有五万种(其中《中国丛书综录》的子目 38891 种;未收的佛藏汇刻及新式丛书,以及待补入的丛书,其子目估计一万种),占整个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①,它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因此研究丛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典籍,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无疑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丛书的概念和起源

什么是丛书,起源于什么时间?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清钱大昕以为丛书是“荟粹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始于左禹锡《百川学海》”^②。

清王鸣盛以“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汇刻为丛书,其在宋则石庐龚士高有《五子合刻》,鄮山左圭禹锡有《百川学海》……。”^③

清法式善说:“考丛书古无刻者,宋温陵曾糙始集《类说》,自《穆天子传》以下二百五十种,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是为丛书之祖。”^④

清李调元说:“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唯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又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是为丛书之祖。”^⑤

清缪荃孙则以“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者为丛书,并说:“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于咸淳癸酉年,先七十余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⑥

近人汪辟疆说：“总聚众书而为书者，谓之丛书。顾丛书之名，至唐宋而始著，丛书之制在周汉已开，《乐正》四术，《诗》存三经，《书》有六体之殊，《易》有十翼之作，丛书之源，远肇于此。”⁷⁷

近人姚名达则说：“《诗》、《书》者，上古之丛书也”，又说：“纵使不敢主《诗》、《易》、《礼》为丛书之说，岂《汉志》所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杨雄所序三十篇亦不敢认为个人自著丛书之始乎？”他批评“近人推溯丛书之源仅及宋末，此其暗陋，抑可笑也”，“钱大昕、顾修之说为断流忘源也。”⁷⁸

近人叶德辉以为“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宋人《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二者为丛书之滥觞。”⁷⁹

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说：“丛书是汇集许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我国最早的丛书是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⁸⁰

等等。这些歧义殊说的出现，是由于对丛书的产生缺乏深入考察造成的。

谈到丛书的产生，谢国桢先生有个很好的见解。他说：“余恒以丛书之名盖由类书演变而成者也。类书中，宋有曾慥《类说》一书”，“汇集古今著述约数十余种，然皆删节不全，此已肇丛书之端。至元陶宗仪《说郛》，近人汇刻书目，始列入丛书，而《四库提要》则列入子部杂家杂纂之属，其书虽在宋左圭《百川学海》之后，而其体例实可窥见丛书与类书演变之迹”⁸¹。可惜谢先生未作进一步论证。

类书与丛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直接取材于众书，且内容庞杂（与所谓子部杂家类的杂学杂纂如唐魏征《群书治要》不同，它们的内容未经过编纂者加工），所不同的是，类书多有特定的编纂体例，或以分类，或以韵目，以便于按图索骥，而丛书无这一编纂体例，不供人作按图索骥地查找，所以前者属工具书，后者属阅读书。我们试将《类说》和《说郛》都共同收录的《番禺杂记》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相同而体例有别。《类说》将其列为“五羊”、“瘴母”、“鬼市”

三词目,下列原文。《说郛》则不标词目,直录原文。然而《类说》的编排是以所收录书书名为纲,下列词目,兼而有类书、丛书二种体例特色,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丛书从类书中脱胎而来的痕迹。

类书始于魏(公元二世纪初)时《皇览》,这是一部由儒臣们为魏文帝“稽查考核”而编纂的书。而丛书的出现较类书晚得多了,大多数人认为是在十三世纪初,因为这时候,一方面学术著述(即图书)较以前成若干倍地产生,另一方面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的运用,为图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人们需要的书多了,并且也较前容易得到,象过去那样依靠手抄摘编汇纂诸书的办法已经不敷应用,于是依靠印刷术直接汇编诸书的方式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丛书的产生。

前人关于丛书概念的不同说法,有的执广义概念,有的执狭义概念,取其一端,顾此失彼,自然既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尽合理部分。钱大昕指出丛书的“荟粹”性质,这是合理的,但不一定非“古人之书”不可;王鸣盛之说中“汇刻”是对的,然而也不尽是“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法式善把《类说》当作“丛书之祖”,强调了它以书为纲的编纂体例,而忽略了另拟词目的体例;缪荃孙从丛书所收书的完整性来确定,则界限过去狭窄;汪辟疆强调总聚,却把同一著作的不同注释、解释的总聚也当作丛书(如《十翼》不过是对《易》的解释);姚名达则又把篇的总聚当作丛书(如《诗》本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叶德辉之说,既考虑到总聚(“并括”),又考虑到丛脞(“举四部”),较之他的前人合理得多,但不一定每部丛书非“举四部”(即经、史、子、集)不可,包括二部、三部也是可以的;上海馆之说,则侧重于从丛书的功用上下定义,至于汇集的是否所谓“重要或难得的著作物”,那是因编纂者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我以为丛书的概念有二,从广义上讲,就是汇集两种以上专书别题一书名而成另一新的著作物;从狭义上讲,其所汇集的两种以上专书,不但要首尾完整,而且内容上必须超过两上部类以上,这样才既

包含总聚的意思，又包含细碎丛脞的意思。这样的狭义的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可是人们往往不区分广义和狭义概念，而常以广义概念代替狭义概念，所以后来把丛书又叫做汇刻书、丛刻、丛刊（至于按一定期限连续出版的期刊，也有称作丛刊的，则另作别论）。

为什么说丛书的狭义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呢？这首先从“丛书”两字的含义看。

《说文解字》云：“丛，聚也”。《尚书·无逸》有：“是丛于厥身”。《尚书·益稷》有“元首丛脞哉”，汉马融注：“丛，总也”。《后汉书·冯衍传下》有：“恶丛巧之乱世兮”，唐李贤注：“丛，细也”。可见丛字的含义，一是总聚，一是细碎、繁琐的意思。

丛书两字连用在一起，首见于唐韩愈的《剥啄行》一诗，诗云：“门以两版，丛书于间”^①。但这并不是书名，而是说关上门，家中聚集着许多书可读。第一次用作书名的是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其序云：“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不遗大，可知其所容也”。可见这是陆氏诗文杂著，而以其书丛脞细碎，遂以丛书名之，故《唐书·艺文志》取其书入丁部集录之别集类。到了宋代，王懋有《野客丛书》，其序云：“仆间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帙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詮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可见这是陆氏有关考订辨证的杂著，故《宋史·艺文志》取其书入子部小说家类。陆、王二人所用的丛字，均取细碎丛脞的意思。

其次，从丛书在中国目录学上的立类来看。

从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起，我国公私家目录著作代不匮乏，然而给丛书专列类目，却是在明代后期。陆、任二书都已失传，从《隋书·经籍志》的注来看，属于史部地理。五代的《五经》，北宋的《七经正义》、南宋初井度的《眉山七史》也都各入其类。《儒学警悟》，《宋史·艺文志》列在子类类事类（即相当于后来的子部类书类）。元陶宗仪的《说郛》，《元史·艺文志》列在子部小说家类。可见明万历以前，对于汇集诸书为一书这种类型，并不如后人以丛书来认

识的。万历以后,丛书开始列类,首见于祁承爌的《澹生堂书目》,然而祁目之后的许多公私家目录著作仍不列丛书目,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还是把丛书列在子部杂家类。这显然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把丛书当作一种新的出版物类型、新的著作物类型来认识,不承认丛书类目。丛书类目的确定,还推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张氏以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所以在经、史、子、集之外,另列丛书目,五项并列,由传统的“四分法”衍变成“五分法”了,这是具有创见的。自此以后,公私家书目多有丛书类目,或隶于子部,或隶于总类。

由此可见,汇集诸书为一书被当作一种新的出版物类型、新的著作物来认识,祁承爌是第一人,清乾嘉时期的顾广圻、李调元、王鸣盛、法式善进一步作了阐述,而张之洞则大加推崇、大加提倡。这说明,一方面是明万历以后丛书刊刻数量日趋繁多,特别是乾嘉以后;另一方面是名实具备的丛书出现以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所以把丛书的起源推溯过早的说法,是既不符合丛书本义,也不符合人们认识实际的。

因此,从丛书的狭义概念来考虑,我国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确实当推《儒学警悟》(前人因《儒学警悟》未发现之前,推《百川学海》为最早,是无可非议的),是书卷一至十为宋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十卷,卷十一至十六为宋程大昌的《演繁露》六卷,卷十七至二十一为宋马永卿的《懒真子录》五卷,卷二十二至三十一为程大昌的《考古编》十卷,卷三十二至三十九为宋陈善的《扪虱新话》上集四卷下集四卷,卷四十上下为宋俞成的《萤雪丛说》二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该书既有汇集者统一重编的卷数,又有子书作者原编卷数,合为一书,分为诸书。第二汇集子书的性质为两大部类(即《石林燕语辨》为史部政书,其余为子部杂学)。完全符合具有总聚丛脞的丛书本义。如果从丛书的广义概念出发,那么南齐陆澄的《地理书》,集《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著作,梁代任昉又增补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便是最早的

地理丛书。

二、丛书发展简述

继《儒学警悟》之后，宋代的第二部丛书便是左圭的《百川学海》，是书以天干为序，凡十集，每集七、八种至十余种不等，计一百种一百七十九卷，所收以唐宋人著述为多，间有晋代及六朝人著述。

元代有陶宗仪的《说郛》，是书陶氏原编的种数、卷数已不可知，传世的一为明代传抄的一百卷本（近人张宗祥重校的《说郛》也为一百卷，即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一为顺治间陶珽校编的一百二十卷本（即宛委山堂刻本）。从流传的抄本和刻本看，它收集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记之书，凡千余种，然而其所集的子书多经删节，只录一卷，正因为它没有做到首尾完整，序跋不遗，因此后人也有不以它为丛书的。

到了明代，丛书才有了大的发展，其原因一是明代社会较宋元时期稳定，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经济上超过前代，这给丛书的大量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二是明代士大夫中多有藏书、刻书的风气，这就促使丛书大量出现。如果说，唐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宋有丛书之实而无丛书之名，那么明代便有了名实具备的丛书了。

明代丛书大体在嘉靖、万历前，沿着《百川学海》、元《说郛》的体例，汇纂越来越庞杂。如吴永的《续百川学海》、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本身就是续编、续刊性质。其它如陆楫的《古今说海》、范钦的《范氏二十一种奇书》、高鸣凤的《今献汇言》、王文禄的《百陵学山》、吴琯的《古今逸史》等，也都仿照《百川学海》和《说郛》的体例，多以汇集子部杂著为限。万历以后，除了在所收子目增多、篇幅增大外，还出现新的丛书类型，如汇集某一历史时期著述的有程荣的《汉魏丛书》（为第一部名实具备的丛书）、钟人杰的《唐宋丛书》（其中虽有元人著述二种，然而序云：“五代故唐之残局，而辽金元皆宋之遗疹”，则可视作编者的一家言）、赵标的《三代遗书》；汇集专门部类的丛书有周子义等《子汇》、顾元庆的《顾氏文房小说》、桃溪居士的《五朝小

说》;汇集某一地方著述的有樊维城的《盐邑志林》等。

但是,如清黄丕烈指出的:“明人喜刻书,而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③,这种恶习也反映在丛书中,如商濬的《稗海》,将宋叶梦得《岩下放言》节录后改题郑景生的《蒙斋笔谈》,书名、作者面目全非;胡文焕的《格致丛书》所收的《洗冤录》,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籍》将王懋的《野客丛书》三十卷,改为十二卷,凡精核之处,多遭删削;钟惺的《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摘《困学纪闻》中论诗之语,题《困学论诗》,摘《玉海》中诗门,题《玉海诗纪》,摘《文献通考》论诗数段,题《文献诗考》。至于如明末清初毛晋父子所刻的《津逮秘书》、《宋名家词》等,足以称道的也不少。

清代是我国丛书刊刻的鼎盛时期,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远胜明代。大体上可分作三个时期,即一清代前期(顺、康、雍三朝),此时由于统治者文网严密,学者多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丛书的刊刻也以汇集经史书籍为多,如张潮的《昭代丛书》、曹溶的《学海堂类编》,纳兰性德的《通志堂经解》、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曹寅的《楝亭十二种》、陈湖逸士的《荆驼逸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张士俊的《泽存堂五种》等。二是清代中期(乾、嘉及道光前期),此时统治者文网渐弛,考据学大兴,丛书门类繁多,有新疏之群经,精校之古子,重辑之佚书,审订之雅记,纷然杂陈。著名的有张海鹏的《学津讨原》、《墨海金壶》,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阮元的《学海堂经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特别是乾隆年间内府编纂的《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搜群籍,部头之大前所未有的。《四库全书》收 3503 种,79337 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 138 种,2411 卷。三是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以后),此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映到丛书刊刻上,一部分是仍沿袭乾嘉学风之余波,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如蒋光煦《别下斋丛书》,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伍崇曜的

《粤雅堂丛书》，潘仕诚的《海山仙馆丛书》，胡珽的《琳琅秘室丛书》，钱培名的《小万卷楼丛书》，王懿荣的《天壤阁丛书》，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等。另一部分向更加专门发展，出现了舆地、金石、目录，词曲丛书，以及反西学东渐的和近代科学丛书，如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名《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王蕴香的《域外丛书》，江标的《灵鹫阁丛书》，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丛刊》、罗振玉的《楚雨楼丛书》、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等。

清代丛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很多丛书的编纂者或是藏书家，或是校勘家，或是某一学科的学者。所以他们刊刻的丛书，有的以汇集、辑佚为主（如《学津讨原》、《守山阁丛书》），有的以仿刻宋元旧本为主（如《士礼居丛书》、《岱南阁丛书》），有的以校勘精审为主（如《抱经堂丛书》、《经训堂丛书》）。因此清代丛书质量远远超过明代。二是有些丛书书名、编纂者虽各不相同，但其书同出一个版本源流，如明末毛晋的《津逮秘书》其原版为胡震亨的《秘册汇函》）版片至清散佚，为张海鹏所得，张氏据此刻印《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后来“借月”版片为陈璜所得，陈氏据此刻印《泽古斋重钞》，《墨海金壶》版片为钱熙祚所得，钱氏据此刻印《守山阁丛书》，陈璜所得“借月”版片，后又归于钱熙祚，钱氏重加校补，刻印为《指海》。

民国以后，丛书刊刻门类也繁多，数量也不少，但是鱼龙相混，高下杂陈，其间可观者当首推《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

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辑的《四部丛刊》初印于1919年，收有经、史、子、集四部书323种，是一部影印宋元旧本和明清精刻精抄本、包罗宏富的大丛书（其中宋本39，金本2，元本18，影写元本5，校本5，朝鲜本4），它将过去不易为人们常见的宋元精刻汇于一集，为人们校勘旧籍提供极大方便。后来又继续搜集，于1934年又印成《四部丛刊续编》，收书81种，1935至1936年又印成《四部丛刊三编》，收书73种。

紧接《四部丛刊三编》印行后，中华书局辑印了《四部备要》，集

经、史、子、集书 336 种，以仿宋体铅字排印。

商务印书馆后又于 1935 至 1937 年辑印成《丛书集成》，汇集宋至清代一百种各类丛书所收子书，原约六千余种，剔其重复存 4107 种，大多数重行排版，并加句读，少数为影印，实际出书为 3111 种，占整数的十分之九。

如果说《丛刊》以“罕见”为主，《备要》以“实用”为主，那么《集成》则兼而有之。总之这三部近代大丛书的出版，是对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传播的一个极大贡献。

三、丛书的价值和利用

丛书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学术内容上、资料价值上更是重要的三分之一，大体上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述均收录在丛书里。因此，丛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对丛书的价值作了精辟地概述。他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并且劝人“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张氏之言颇为地道的。

丛书以其网罗宏富远胜单刻本，大至经、史、子、集四部，以及社会风俗、科技之书，细而琐事异闻、茶酒志怪之事，无不可于丛书中求之，特别是许多被旧时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雕虫小技”，从无单刻的机会，而以丛书形式流传至今，往往寻求一些不著名的诗文别集、唐宋以下复杂繁多的说部，则无丛书不可。所以丛书对于方便学者，保存古代文化和古籍的流传，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试举其荦荦大者分述如下：

第一，汇集的功用。丛书把单种图书汇集在一起，少则两种（如明俞安期的《庄骚合刻》），多至数千种（如《丛书集成》）。这种汇集既为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作出贡献，又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省去了东找西寻的麻烦，甚至不知何求的苦恼。特别是汇集某一部类、某一学科的专类丛书，尤便于学者。譬如一个中型图书馆，或者某一学

者,如果备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这三部大丛书,那么读者或他本人研究我国古代一般问题所需要的图书,大体上可以解决百之七、八十。再譬如一个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人,如果具备《音学五书》、《棟亨五书》、《小学汇函》、《许学丛书》,那末基本上可以不外求。至于那些从无单本行世的丛书,则舍丛书无求。如我国最早研究水稻的专著明黄省曾的《稻品》,从无单刻本,但在《广百川学海》、《百陵学山》、《夷门广牍》以及近代的《丛书集成》里均有收录。还有的书,虽曾有单刻本行世,但现已流传稀少,罕为人见了,而在丛书里却为人们常见,如宋唐积的《歙州砚谱》和宋米芾的《砚史》,虽然前者有明华氏刻本,后者有宋刻本,但能见到的机会实在太少,而此二书在《百川学海》、《学津讨原》、《说郭》、《美术丛书》中均有收录,便成了易得之物。

第二,辑佚的功用。古代典籍经过长期人为或自然毁坏,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则名亡实存,于是后代的许多学者从类书或其它著作中考求佚文,掇拾补录,重新辑出,刊刻在丛书里,这对恢复古代典籍的原貌作出了很大贡献。如苏轼之子苏过的《斜川集》,南宋已稀,清康熙时下诏也求之不得。据王士禛《香祖笔记》说,康熙八年,闻有书贾持此书求索,索价二百金,“惜未得见之,其存佚今不可知”。可是乾隆年间历城周永年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厘为六卷,嘉庆间的法式善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事二卷,首刊于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后来《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均有收录。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斜川集》,它虽不全同原貌(据《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著录为十卷本),但应是原书的百分之八十了,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从元末到清初,常有书贾作假,将宋刘过的《龙洲集》改题为《斜川集》,以二人皆名“过”而欺世,贻误很多学者。后人能见到《斜川集》的真实面貌,这是丛书刊刻的一大功绩。特别是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书 66 种,史部 41 种,子部 103 种,集部 175 种,共计 375 种,4926 卷,而

《聚珍版丛书》则是专门汇集儒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罕见书。后来还有专门汇集辑佚书的丛书，如黄奭的《汉学堂经解》（一名《黄氏逸书考》），收《汉学堂经解》112种、《通德堂经解》17种、《通纬》72种、《子史钩沉》84种，合计为385种。王谟的《汉魏遗书钞》收书400余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多达617种，特别是马氏这位家贫而勤奋的学者，他“广引博征，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辞只字，罔弗搜辑”^③。其它如张澍的《二酉堂丛书》、茆泮林的《十种古逸书》、孙冯翼的《问经堂丛书》等，都是以专门汇集辑佚书而著称。这些辑佚书遍及四部，为我们提供新的书源。

第三，提供精本、善本。一部古代著述流传至今，中间经过多次传抄、刻印，产生不同的版本。一般来说，越是离著者时代近的早期本子越可靠，所以前人重视宋元旧刻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当然把宋元旧刻当作古董欣赏，一味地唯宋元旧刻称是，即所谓“佞宋”者，也不对），但是越是早期的本子，流传的也越稀、越罕见，即使有幸存的几部，藏书家也常秘不示人。嘉庆年间一些著名学者如钱大昕、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等人，偶尔在朋友处看到一部宋版书，便严肃认真地在册尾写下跋语，留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敬观”，或者钤上“某某过眼”印记，当作一生最大的眼福。即使在今天，能够见到宋元旧刻的机会和人还是很少的。但在毛晋的《津逮秘书》、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里就收有据宋元旧本刻印的图书，特别是近代印刷术的发展，影印图书出现（或与原本大小相同，或缩小原本），其字体、行款一如原书，使用价值与原书相等。这就使旧时学者们见不到宋元旧刻，现在都可以方便地看到，如丛书中《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宋元旧刻的影印本。

还有的书在多次传抄、刻印过程中产生脱漏删节现象，后人在汇为丛书时重加校勘，这样的丛书本就远胜单刻了。特别是清代很多经过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编纂的丛书，其文献价值更高。如黄